



民国间 古代文学研究名著导读

- ◎ 民国间古代文学通史、专题史名著导读
- ◎ 民国间断代文学史名著导读
- ◎ 民国间俗文学史、民间文学史名著导读
- ◎ 民国间古代文学批评研究名著导读
- ◎ 民国间古代韵文学研究名著导读
- ◎ 民国间古代散文研究名著导读
- ◎ 民国间古代小说研究名著导读
- ◎ 民国间古代戏剧研究名著导读

王友胜 李鸿洲 林彬晖 李跃忠 著



岳麓书社



民国间
古代文学研究名著导读



装帧设计

TEL: 039773134713

ISBN 978-7-80761-305-3



9 787807 613053 >

定价: 30.00元

湖南科技大学研究生教材出版基金资助



民国间 古代文学研究名著导读

王友胜 李鸿渊 林彬晖 李跃忠◎著



岳麓書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国间古代文学研究名著导读/王友胜等著. —长沙:

岳麓书社, 2009

ISBN 978 - 7 - 80761 - 305 - 3

I. 民... II. 王... III. 古典文学—文学研究—著作—简介
—中国—民国 IV. 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90295 号

民国间古代文学研究名著导读

作 者:王友胜 李鸿渊 林彬晖 李跃忠

责任编辑:杨云辉

责任校对:欧阳慧

封面设计:刘 峰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爱民路 47 号

电话:0731—88885616(邮购)

邮编:410006

网址:www.yueluhistory.com

2010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890×1240 1/32

印张:14.625

ISBN 978 - 7 - 80761 - 305 - 3/I · 889

定价:30.00 元

承印:长沙银都印务有限公司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印务部联系

电话:0731—88884129

目 录

〇〇一 第一章 绪论

〇一六 第二章 民国间古代文学通史、专题史名著导读

〇一六 一、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导读

〇二三 二、胡适《白话文学史》导读

〇三〇 三、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导读

〇三八 四、钱基博《中国文学史》导读

〇四三 五、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导读

〇五三 六、梁乙真《中国妇女文学史纲》导读

〇五七 七、朱谦之《中国音乐文学史》导读



一三三 第四章 民国间俗文学史、民间文学史名著导读

- 一三三 一、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导读
- 一四一 二、杨荫深《中国民间文学概说》导读
- 一四六 三、玄珠《中国神话研究ABC》导读
- 一五三 四、胡怀琛《中国民歌研究》导读
- 一五九 五、胡怀琛《中国寓言研究》导读

一六四 第五章 民国间古代文学批评研究名著导读

- 一六四 一、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导读
- 一七一 二、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导读
- 一七六 三、方孝岳《中国文学批评》导读
- 一八一 四、朱维之《中国文艺思潮史略》导读
- 一八五 五、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导读
- 一九〇 六、黄侃《〈文心雕龙〉札记》导读
- 一九四 七、朱光潜《诗论》导读
- 一九九 八、傅庚生《中国文学欣赏举隅》导读
- 二〇三 九、朱自清《诗言志辨》导读

二一一 第六章 民国间古代韵文研究名著导读

- 二一一 一、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导读
- 二一九 二、龙榆生《中国韵文史》导读
- 二二四 三、钱钟书《谈艺录》导读
- 二三〇 四、胡朴安《诗经学》导读
- 二三六 五、游国恩《楚辞概论》导读
- 二四二 六、罗根泽《乐府文学史》导读
- 二四六 七、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导读
- 二五一 八、苏雪林《唐诗概论》导读

- 二六〇 九、闻一多《唐诗杂论》导读
- 二六七 十、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导读
- 二七三 十一、胡云翼《宋诗研究》导读
- 二七八 十二、梁昆《宋诗派别论》导读
- 二八四 十三、王易《词曲史》导读
- 二九〇 十四、吴梅《词学通论》导读
- 二九七 十五、薛砺若《宋词通论》导读
- 三〇四 十六、任中敏《散曲概论》导读

三一— 第七章 民国间古代散文研究名著导读

- 三一— 一、方孝岳《中国散文概论》导读
- 三一七 二、陈柱《中国散文史》导读
- 三二五 三、瞿兑之《中国骈文概论》导读
- 三三〇 四、刘麟生《中国骈文史》导读
- 三三九 五、卢前《八股文小史》导读

三四五 第八章 民国间古代小说研究名著导读

- 三四五 一、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导读
- 三五四 二、胡怀琛《中国小说研究》导读
- 三五八 三、谭正璧《中国小说发达史》导读
- 三六二 四、郭箴一《中国小说史》导读
- 三六六 五、胡适《中国章回小说考证》导读
- 三七二 六、阿英《晚清小说史》导读
- 三七八 七、俞平伯《红楼梦辨》导读

三八五 第九章 民国间古代戏剧研究名著导读

- 三八五 一、王国维《宋元戏曲史》导读

- 三九三 二、吴梅《中国戏曲概论》导读
 四〇一 三、卢冀野《中国戏剧概论》导读
 四〇八 四、周贻白《中国剧场史》导读
 四一六 五、徐幕云《中国戏剧史》导读
 四二五 六、董每戡《中国戏剧简史》导读

- 四三二 附录一 《民国丛书》著录文学类研究著作存目
 四三六 附录二 主要征引、参考书目
 四四二 附录三 本书导读著作研究论文索引
 四六〇 后记

第一章

绪论

文学研究几乎与文学创作有着同样悠久的历史，尽管早期的文学研究是不自觉的。《淮南子·道应训》载：“今夫举大木者，前呼邪许，后亦应之，此举重劝力之歌也。”^① 此处文学的创作者与接受者是合而为一的，劳动者（即作者）对自我创作的“举重劝力之歌”的接受是朦胧的，不自觉的。若以孔子整理、编辑《诗经》算起，自觉的文学研究也有二千五百年的历史。在这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古代文学研究的成果可谓汗牛充栋，对此加以集中梳理、评述与总结的著述目前主要有郭英德等人撰写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类似的著作还有尚学锋、过常宝、郭英德合著的《中国古典文学接受史》，陈文忠的《中国古典诗歌接受史研究》，而以重要作家与经典作品进行学术史个案研究的著述则更多^②。但是，我们也由此注意到，绝大多数的论著不约而同地将讨论的范围与时限划定到清代为止，对于民国年间学者们的古代文学研究成果加以反思与总结的论著却较少，从而与这一时期所取得的巨大学术成就很不相称。王瑶主编的《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陈平原主编的《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二编》两书以学者为个案，集中剖析了梁启超、王国维、鲁迅等三十八位一流学者的治学方法与学术成果，但涉及的人，论述到的书并

①《淮南子集释》（中），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831页。

②其详可参陈文忠：《20年文学接受史研究回顾与思考》，《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



不局限于民国年间，而贯穿于该学者的一生，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学者是解放后才成名的。赵敏俐、杨树增合著的《20 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黄霖主编的《20 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①，蒋述卓、刘绍瑾、程国赋、魏中林等合著的《二十世纪中国古代文论学术研究史》等著述虽然包括民国时期的古代文学研究史，但并不局限于这一时段。百花洲文艺出版社组织策划的《国学大师丛书》收录有二十八位学术大师的评传，上海古籍出版社组织策划的《蓬莱阁丛书》，不仅收录名著全文，正文前还有名家导读，但以上两种丛书都不是古代文学研究的专门著作。基于这一学术研究现状，我们有了编写这本《民国间古代文学研究名著导读》的动因。

本书所谓“民国间”，是指从 1911 年辛亥革命结束清王朝的统治到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历时三十八年。这一时期虽然为时不长，但却是继先秦孔孟、老庄、杨墨、孙韩等诸子百家争鸣，北宋关学、洛学、新学与蜀学同时并兴之后，我国学术文化思想史上第三个理论思维活跃、百家学说竞胜的高潮时期。从中国学术文化发展史的角度来看，这一学术文化鼎盛局面的形成固然有很多缘由，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恐怕与当时异族与外敌的武力入侵与文化入侵不无关联，前者是被动的，后者则主动接受与被动接受兼而有之。基于这样的政治与文化态势，民国间的学者们肩负起了重建社会与重建文化的双重历史使命。先就前者而言，民国年间，中国政坛风云变幻，波谲云诡，中华民族遭受日寇欺凌，内忧外患，国势衰微，学林人物一如芸芸众生，同样历经劫难与洗礼，他们有人荷戈上阵，奋勇抗敌；有人禀笔直书，议论时政；但更多的人则是走进书斋，潜心学术，著书立说，坚持学术救国与教育救国。再就学术文化建设来说，此期随着西学东渐，西方文化深深地影响着当时学人的思维与视野，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发生了深刻的转型，旧有的学术文化格局在崩解与重组，新的

^①按：此套丛书包括总论卷、诗歌卷、词学卷、散文卷、小说卷、戏曲卷及文论卷。



学术文化态势在逐步形成与成熟，中西文化比较，或以西方的理论与观念来研讨中国固有的学术文化已渐渐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时代思潮。大批英才俊杰，如严复、梁启超、王国维、鲁迅、胡适、陈寅恪、钱穆、冯友兰等汲古纳新，融汇中西，引领学术思潮，在学术研究上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成绩斐然，可载史册。他们深邃的学术思想、丰硕的著述成果及独到的研究方法，都值得我们穷毕生精力去作专门研究。

二

民国年间的古代文学研究属于当时学术文化建设的一部分，而且是很重要一部分。与此同时，古代文学研究的方法与特点明显地受到了当时学术文化思潮的影响，当然也会体现出本研究领域内的新特征。

首先，民国间古代文学研究名家辈出，佳作纷呈。众所周知，古代学者学术研究的成果多以诗话、文评、笔记、序跋、选集、评点、札记等形式出现；多零星的、分散的表述，少专门系统的著述；多感悟式的自由发挥，少理性的、逻辑的概括。民国时期与当时政治、经济衰败不相对称的是，学术研究大放异彩，传统文化得到继承，传统典籍得到整理。随着学术的转型，研究著作如雨后春笋，日见其多。据《民国时期总书目》^①统计，1911年到1949年间，共有各类著述近十万种，这个数量约等于历代著作之总和，其中相当一部分为古代文学研究的著作。民国间出现了大量按现代教育制度建立起来的新式学堂，这给学林人物提供了安身立命、表达思想、传道授业的途径与舞台。因教学的需要，他们所撰大部分著作当时其实就是课堂讲义，经修改出版后，才正式成了学术著作。这一特性决定了民国间大量著作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明显地带有教材的“痕迹”。即使这样，因其较早成书，故仍具有开创性。

^①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



民国间即有学者将这些学术名著汇于一编，便于读者阅览。如世界书局1936年影印的由刘麟生编辑的《中国文学八论》，其中包括刘麟生本人的《中国文学概论》、《中国诗词概论》，方孝岳的《中国散文概论》、《中国文学批评》，瞿兑之的《中国骈文概论》，胡怀琛的《中国小说概论》，卢冀野的《中国戏剧概论》及蔡正华的《中国文艺思潮》等八部古代文学研究著作。^①1980年代以来，随着传统“国学热”的升温，许多淡忘已久的民国间学者，尤其是那些解放后移居港台乃至海外的学者，又重新回到了我们的视线之内，再度纳入我们的研究范围。诸多出版社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学术信息，为了满足读者之需，相继再版了大量民国间学术著作，其中多以丛书的形式面世，影响较大的如上海书店出版社影印的《民国丛书》（凡五辑，收书计1087种），河北教育出版社策划的《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凡33卷44家），东方出版社策划的《民国经典学术文库》（含文学史类部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策划的《二十世纪国学名著》，浙江人民出版社策划的《近人学术述林》（12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策划的《二十世纪国学丛书》，辽宁教育出版社策划的《新世纪万有文库》（含近世文化书系部分），上海古籍出版社策划的世纪人文系列丛书《世纪文库》，凤凰出版社策划的《近代学术名家大讲堂》丛书（第一辑八种），团结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民国珍本丛刊》（20种）；有些是以作者的“文集”、“全集”的形式出版，如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的《饮冰室合集》（凡12册），花山文艺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俞平伯全集》（凡10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出版的《陈寅恪集》（凡13种14册），中华书局2007年出版的《刘永济集》（凡15种10册）；还有些则只收专文，如中国青年出版社策划的《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文化随笔大系》（凡五辑，每辑二十卷），凤凰出版社2008年出版的葛剑雄主编的《近代学术名家大讲堂》等。

①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出版的《中国文学七论》收入除方孝岳的《中国文学批评》外的其他七部著作。

这里特别要介绍的是《民国丛书》，该丛书分哲学宗教、社科总论、政治法律军事等十一个大类，文学类乃其中之一，所收著作从民国间十万种书籍中遴选而出。著名史学家周谷城在序中总结该丛书的选择标准与原则时说：“（我们）既要着眼于当前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又要达到保存史料、抢救文献的目的。既要兼顾各科各类之齐备，又要容纳各家各派之并存。既要突出重点，又要力求系统完备。既要重学术性与资料性，又要注意可读性与实用性。既要重点选收具有代表性、权威性的著作，又要适当选



的开创者。他治学的领域十分广泛，但治学的方法却是一以贯之的，陈寅恪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高度概括地说：“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① 后来有人将这三条原则进一步归并为“二重证据法”。王国维的这一治学方法体现在他的种种著述中，也贯穿于他的一生。他的许多著作都首开风气，《红楼梦评论》、《人间词话》与《宋元戏曲史》都被公认为是具有开创性的。这些成就的取得与他充分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是分不开的。陈寅恪本人治学文史贯通，治文治史擅长彼此参证，他早年在清华讲授“唐诗校释”课程，晚年在中山大学讲授“唐代乐府”、“唐诗证史”等课，其笺诗、证诗所用的即为历史的眼光与考据的方法，既以诗为史料，纠旧史之误，补史实之阙；又以史证诗，考其“古典”，求其“今典”，探其脉络，以得通解^②。陈寅恪这方面的代表作《元白诗笺证稿》、《柳如是别传》以及早年在清华所撰的《韦庄秦妇吟校笺》等著作^③，多以诗考史、释史，或以史证诗、释诗，此即后来学界所总结的陈寅恪的诗史互证的研究方法。再如胡适，他是民国间最喜欢谈治学方法的学者，相关文字约在百万字以上。如《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1919）、《〈国学季刊〉发刊宣言》（载《国学季刊》第1卷第1期，1923年1月）、《治学的方法与材料》（载《新月》第1卷第9号，1928年11月）、《校勘学方法论》（载《国学季刊》第4卷第3期，1928年3月）、《考据学的责任与方法》（上海《大公报·文史》周刊第1期，1946年10月15日）、《治学方法》（1952年在台湾大学的连续演讲），此外还有《介绍我自己的思想》、《实验主义》、《论国故学》、《少年

①《陈寅恪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版，第6页。

②汪荣祖：《史家陈寅恪传》，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8页。

③此文原题《读秦妇吟》，载《清华学报》第11卷第4期，1936年，作者后来在昆明自印线装本，改题《秦妇吟校笺》，再后来广州出油印本，改题《秦妇吟笺证》。

中国之精神》以及致毛子水、罗尔纲、陈之藩等人的信件等，皆述其治学方法的心得体会。通读胡适论学相关文章，我们认为其治学方法可表述为：“寻求事实，寻求真理”的科学精神；“只认得事实，只跟着证据走”的科学态度；“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科学方法。尤其是后者，可谓20世纪中国学术界最响亮的学术口号。胡适运用此法在中国古代章回小说研究，如《红楼梦考证》、《水浒传考证》等书中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由此可见，民国间的古代文学研究者虽然有着共同的学术生态环境，然师承有别，流派不同，方法各异，故在具体的研究中总会表现出鲜明的个性，或开启新途径，引进新方法，或提供新观念，留下新问题，其著述得风气之先，共同构成了民国间古代文学研究的繁荣景观。

第三，民国时期的古代文学研究者多为中西贯通，古今融合，往往在多个学术领域有所建树，有的甚至是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们中有一部分人的青年乃至中年在晚清度过，受过严格的私塾教育，有些甚至参加过清朝的科考，任过清朝的官职，国学的功底十分坚实，在辛亥革命前即用文言撰著并发表过论著。还有一部分人则进过新式学堂，在大学接受过专门系统的训练，有些人掌握了一门、数门甚至数十门外语，漂洋过海，在日本、美国及欧洲列国求学、访学，因有外语作为交流的工具，使得他们汲取新的文学观念与学术方法变得轻松与便利。这样，民国间学者既有了深厚的旧学根底，较高的文学鉴别力，又能资西学以立论，从而使其著述达到较高的学术成就。傅斯年曾深刻地指出：“研治中国文学，而不了解外国文学，撰述中国文学史，而未读外国文学史，将永无得真一日。”^①王国维早年研讨西方哲学、美学，造诣颇深，能用西方美学解剖中国文学，发表于1904年的《红楼梦评论》^②从现代哲学、美学的高度揭示这部作品的新价

①傅斯年：《王国维著〈宋元戏曲史〉》，《新潮》第1卷第1期，1919年1月1日。

②连载于《教育世界》第76、77、78、81号。



值，尤其用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哲学思想分析《红楼梦》，虽然带有某种时代的局限，但仍不失为一种可贵的尝试。他1912年旅居日本，费时三月完成了七万字的《宋元戏曲史》。该书既有中国传统的朴学考据学的特色，又以近代西方美学为理论基础，率先以现代观念肯定了元杂剧的文学价值，从而使此书达到了很高的理论深度。鲁迅主要以传统方法治学，但他对外国文学仍有相当的了解与研究，早在1907年撰写《摩罗诗力说》时，即借鉴过勃兰兑斯的《俄国印象记》、《波兰印象记》和利特耳的《匈牙利文学史》等；“五四”以后，鲁迅仍多次引述勃兰兑斯关于“轨道破坏者”、关于由“精神上的‘聋’”招致来的“哑”、关于俄国这片“黑土”如何“长育了文化的奇花和乔木”等名言；直到1933年底，他在《致徐懋庸》的书信中还说：“文学史我说不出什么来，其实是G·Brandes的《十九世纪文学的主要潮流》虽是人道主义的立场，却还很可看的。”^①足见鲁迅对勃兰兑斯的推崇或勃兰兑斯文学史著作给鲁迅的影响之大。鲁迅在北京大学、厦门大学及中山大学先后完成了《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及《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等文学史论著，还拟写一部完整的《中国文学史》，只可惜最后没有完成。显然鲁迅对文学史撰著的热衷，在文学史写作中宏大的格局，敏锐的眼光无疑也是受到了勃兰兑斯等人的文学史著作影响的。当然，民国间也有论著在借鉴西方理论时有生吞活剥、消化不良的表现。钱基博早在上个世纪20年代即深有体会：“民国肇造，国体更新，而文学亦言革命，与之俱新。尚有老成人，湛深古学，亦既如荼如火，尽罗吾国三四千年变动不居之文学，以缩演诸民国之二十年间，而欧洲思潮又适以时澎湃东渐，入主出奴，聚讼盈庭，一哄之市，莫衷其是。榘而为论，其蔽有二：一曰执古，二曰鹜外。”^②刘永济亦说：“今代学制，仿自泰西，文学一科，辄立专史，大都杂撮陈篇，补苴琐屑，其下焉者，且裨贩异国之

①《鲁迅全集》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03页。

②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绪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7页。

作，绝无心得之言，求其视通万里，心契千载，网罗放失，董理旧闻，确然可信者，尚无其人。”^①

民国间专力从事古代文学研究的学者很少，大多涉猎多个学术领域，有些是文学研究与文学创作兼擅，与我们当代重专家之学不同，民国间多传统意义上的通人之学。周作人撰写过《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等著作，又是著名作家，杂文尤佳，他在《我的杂学》一文中说：“我平常没有一种专门的职业，就只喜欢涉猎闲书，这岂不便是道地的杂学。”^② 闻一多同时对神话、《楚辞》、唐诗有相当专精的研究，另外，他还广泛研讨过文献学、文字学、训诂学，尤擅书法与篆刻。胡适更是一个大杂家，他1959年在台湾“中国图书馆学会”年会上的演讲中说：“今年我六十九岁了，还不知道自己的本行到底是哪一门？是中国哲学呢？还是中国思想史？抑或是中国文学史？或者是中国小说史？《水经注》？中国佛教思想史？中国禅宗史？我所说的‘本行’，其实就是我的兴趣。”

民国间学者治学范围广博以王国维与梁启超两位为杰出代表。王国维学问博大精深。在文学上，著有《宋元戏曲史》、《人间词话》及《红楼梦评论》三大名著，还有古典诗词创作；在哲学上，对中国古代哲学及西方康德、叔本华、尼采的哲学均有深入研究；在美学上，被认为是“近代美学之父”，是将西方美学系统引入中国的第一位学人；在史学上，是“新史学的开山”，其《古史新证》中的二重证据法开拓了史学的新向度，提出要系统整理古史资料，“则非于纸上材料外，更得地下材料之助不为功”。另外，对上古史、唐史、宋史、蒙古史的研究，对历史地理的种种发明，对历代文物的精心考证，对敦煌学的探析，无不显示了王国维史学研究的博大与精深；在古文字、语言学方面，其于甲骨文、金文、简牍文、石经及《说文》均有研究；在训诂

①刘永济：《十四朝文学要略·叙论》，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页。

②《周作人批评文集》，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第331页。